

庆祝中山大学建校六十周年

(1924—1984)

東南亞歷史論文集



.4083

4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

目 录

一、博南古道考·····	段立生 (1)
二、宋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和邦交关系·····	江醒东 (9)
三、明代的四夷馆·····	余定邦 (20)
四、十九世纪越南史籍中“华、汉”含义的考证·····	金雨雁 (29)
五、文莱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初探·····	马 宁 (38)
六、驻扎官制度下的霹雳——评休·罗爵士的殖民政策·····	罗汝材 (45)
七、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菲律宾的天主教会·····	何安举 (55)
八、法国在柬埔寨的殖民统治及其崩溃·····	许肇琳 (66)
九、评披汶政府的十二个通告·····	张映秋 (76)
十、日本侵占菲律宾和菲律宾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刘迪辉 (86)
十一、1644—1795年清朝政府的华侨政策·····	吴行赐 (98)
十二、关于罗芳柏所建兰芳公司的性质问题·····	温广益 (107)

CONTENTS

<i>A study of the Ancient Bonan Route in Yunnan Province.....</i>	<i>Duan Lisheng (1)</i>
<i>Trade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during the Song Dynasty.....</i>	<i>Jiang Xingdong (9)</i>
<i>The "Si Yi Guan" of Ming Dynasty.....</i>	<i>Yu Dingbang (20)</i>
<i>Research 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Words "Han" and "Hua" used in the Literature of Vietnamese History in the 19th Century.....</i>	<i>Jin Yuyan (29)</i>
<i>A Preliminary Inquiry on the "Golden Age" in the History of Brunei</i>	<i>Ma Ning (38)</i>
<i>Perak under the Resident System ----- A Review of Hugh Low's Colonial Policy</i>	<i>Luo Rucai (45)</i>
<i>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Spanish Rule</i>	<i>He Anju (55)</i>
<i>The French Colonial Rule in Cambodia and its Decline.....</i>	<i>Xu Zhaolin (66)</i>
<i>A Review of Twelve State Conventions of Pibul's Government</i>	<i>Zhang Yingqiu (76)</i>
<i>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rmed Struggle of the Philippine People against Japan.....</i>	<i>Liu Dihui (86)</i>
<i>The Policy of Qing Dynasty towards Overseas Chinese from 1644 to 1795.....</i>	<i>Wu Xingci (98)</i>
<i>On the Nature of Lan Fong Kong Si Established by Luo Fangbo.....</i>	<i>Wen Guangyi (107)</i>

博南古道考

段立生

远在公元前二世纪之前，中、缅、印之间就已经存在一条商道，称为蜀身毒道。它起于蜀（成都），分经邛（西昌）、犍（宜宾）至滇，由云南驿（祥云）经龙尾关（下关）至永昌（保山），再从滇越出缅，或西行经丽水城（密支那），抵身毒（印度）。据文献载，这条通道至迟于公元前二世纪便有商贾往来。^①而真正由官方修筑成驿道，则肇始于秦汉，全线完成于唐朝，以后历代又逐渐增修完善。

博南古道是蜀身毒道中的一段，包括从云南驿（祥云），经龙尾关（下关），至永平（汉称博南县），然后越过博南山，横渡澜沧江，到达滇西重镇永昌。目前，永平至保山区间还可看到一段古道的遗迹，飞架澜沧江的铁索桥依旧保存，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实物资料。最近笔者沿博南古道部分地段作了实地考察，参证历史记载，拟对博南古道的形成过程，沿途驿馆、桥梁设施，以及历史作用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作为对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部分。

一

秦汉之际，由四川入云南的主要路线有两条：

1、犍道。由成都经宜宾（即犍道）、盐津、昭通、昆明、安宁、至南华。因汉时称昭通为朱提，故又名朱提道。

2、灵光道。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越嶲（即灵光），西昌，姚安，至南华。因该道经过旄牛夷地区，又叫旄牛道。

犍道和灵光道在云南驿会合，西行至保山，这就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博南道。

犍道的开辟始于秦。秦惠文王取得四川后，开始经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地区。到李冰任蜀郡太守时，就已经着手在川滇交界处修筑犍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派常頌接着开五尺道，由宜宾，经昭通，到达曲靖附近。秦朝二世而亡，开发祖国西南的未竟事业，便由汉朝承袭。

汉武帝时沿犍道经略南夷地区的情况，兹按年代顺序略述如下：

建元六年（前135），唐蒙使南越归，请通夜郎。置吏，属犍为郡。

元光元年（前134），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

元光五年（前130），再发巴蜀卒数万人治南夷道。

元狩元年（前122），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上书请通蜀至身毒道。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四出求道。汉使至滇，被昆明夷所阻。

元鼎五年（前112），发兵攻南越，命驰义侯调夜郎兵助征。

元鼎六年（前111），置牂牁郡。

元封二年（前109），汉兵临滇，滇王出降，置益州郡。

元封六年（前105），汉军收服昆明夷和哀牢夷，设僇唐、不韦等数县，属益州郡。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沿灵光道开发西夷地区：

元光六年（前129），命司马相如出使西夷至邛、笮，设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郡。又发巴蜀兵治西夷道。

元鼎六年（前111），征西夷，置越僇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

汉武帝继秦始皇之后，顺应时势的要求，力排时人所谓放弃西南夷之议，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②坚持不懈三十余载，使汉朝的势力达到滇池以南地区。

随着中原文化在西南边疆的传播，东汉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③博南县即今永平，永昌郡治在保山。由祥云经永平至保山的博南道，显然是在永昌郡设置前后才辟为官道的。

当时的民谣说：“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便是最好的证明。

《永昌府志》载冯更性《重入永昌道》诗曰：“兰沧鸟道汉时通，绝壁千寻拥霁虹。风里云梯吹缥缈，云边飞阁望玲珑。”亦是说博南道是汉时所通。

如今博南山下还立有赵藩记博南山的石碑。碑上刻有《水经注》中关于汉明帝通博南山道的记载。

可以说，将博南道修成官驿大道是为着永昌郡的设置，而永昌郡的设置则标志着秦汉以来开发西南边疆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自此，中央王朝在保山设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使中国的政治势力达到中缅边境，奠定了我国西南疆域的基础，对国家政权的统一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

从汉至唐期间，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博南古道有关。

三国时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④由青蛉（大姚）、弄栋（姚安），沿博南道至永昌。《蛮书》卷二兰沧江条说：“诸葛亮征永昌，在此筑城。”当诸葛亮返回南中后，还推荐永昌不韦县人吕凯为云南太守。⑤

随朝史万岁讨爨翫，“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渡西二（洱）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⑥大体是顺灵光道，由姚安转博南道至洱海。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命梁建方征讨松外蛮，“以通西洱天竺之道。”⑦

玄宗天宝十年（751），鲜于仲通三路进军攻南诏，阁罗凤求和不许，遂大败唐军于洱海，鲜于仲通全军复没。南诏闭唐，转而依附吐蕃。

德宗贞元九年（793），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遣幕府崔佐时由石门趣云南，而南诏复通。”⑧

德宗贞元十年（794），袁滋奉使南诏，册封异牟寻。出石门关，韦皋“差巡官监察

使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⑨袁滋至阳苴咩城(大理)行册封礼,及归,著《云南记》五卷。樊绰《蛮书》卷一记石门至柘东城(昆明)行程,及柘东城至阳苴咩城行程,皆录自袁滋《云南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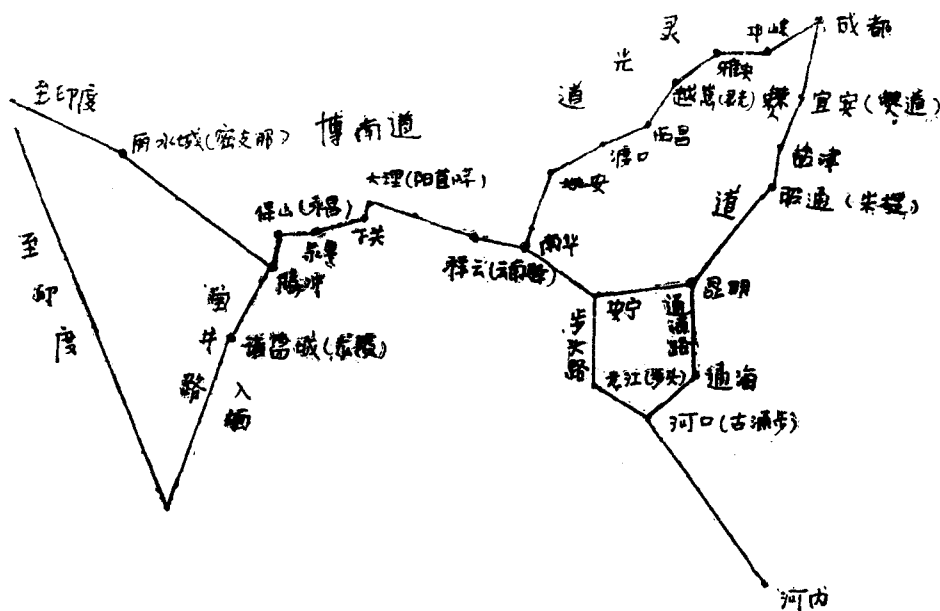
上述历史事件的功过且置之不论,仅从交通方面而言,无论是大规模的用兵,还是使节的往返,都有益于驿道的修缮和通畅。

南诏政权对永昌以南通缅甸道的修建曾作了重要贡献。代宗宝应元年(762),阁罗凤“西开寻传”,使南诏辖壤达今怒江、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可以肯定,到了唐代,由四川经云南到达缅甸、印度的道路,在我国境内的部分,大体已经全线筑成官道。

《腾越州志》卷二道路载:“唐时通天竺亦取道於腾越,盖有两道焉:一自诸葛城南行二百里至乐城,入骠国境,即今缅甸也。……此则自腾越而南,由缅甸城转西以至东天竺界,凡三千五百里,至中天竺一千六百里,共五千一百里也。自诸葛城西去腾冲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汉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没卢国。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东北界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此则自腾越而西,由丽江进藏地。至东天竺国北界二千里,又千二百里至中天竺,仅三千二百里。视南道径一千九百里也。然则腾越正与天竺相对,中间为赤发野人所隔。”所以主要是由南道入缅。

永昌以南至缅甸一段道路,明朝杨慎称之为“宝井路”。其《宝井谣》曰:“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⑩在《南诏野史》中,杨慎还详细记载了由宝井路入缅途程。

樊道,灵光道,博南道和宝井路,构成由四川经云南入缅甸的通道。加上唐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由安南府城沿红河而上,由步头(元江)登陆,至安宁城的步头路,以及由古涌步(河口)登陆,经通海至柘东城的通海路,⑪唐代已经形成一个连接川、滇、越、缅、印的陆路交通网。如图所示:



唐代西南交通示意图

博南道对于沟通川、滇、越、緬、印的交通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一条衔接诸道的主干线。历代政府对它比较重视，曾花费大量钱财来营建沿途的驿馆和桥梁设施。

云南驿是博南古道的起点站。云南驿这个名称起于何时，史无明载。据说西汉时彩云南现，遂有云南之称。元封二年置益州郡，辖有云南县。而云南成为“驿”，应该说是博南道开拓为官道以后的事。《说文》曰：“驿，置骑也。”即是由官家营办的供给过往行人使用马匹和歇息的地方。宋人杨佐入云南买马，“王馆佐於大云南驿。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至交趾，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茸者。”②可见唐以后，云南驿已经成为通往各地的交通枢纽。

由云南驿西行，经下关、漾濞、至永平一段，现今的滇緬公路基本上是遵循汉唐故道，所以古道旧貌已被破坏。永平至保山一段，滇緬公路改道北上，经大栗树，渡澜沧江至功果，古道遗迹得以保留。

我们从博南古道的现存遗迹，来推测它过去的情况。

永平至保山路虽不远，却需要“渡博南，越兰津”，是全线工程最艰巨处。从现今永平县杉扬公社岩洞大队沿古道上山，道宽三、四米，用大青石砌成，每隔一段，有一平台，可供攀登者驻马憩息。博南山的走向与澜沧江平行，山高势险，驿道盘桓而上，至山顶有一园拱形山门，门洞横跨驿道，门楼上书“雄关耸峙”四字，“雄”字已经剥落。估计是古代在博南山顶设置的一个关卡。穿过山门，开始下坡，行至半山，便可望见闻名中外的霁虹桥。两端桥墩高出江面十数米，桥楼筑有关楼过亭。桥由十六根铁索组成，每根铁索约重一千九百六十公斤，跨度六十米，上铺木板，宽三米七。桥凌空而架，上下无倚。不禁使人想起杜牧的《阿房宫赋》，其辞云：“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宫，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霁虹桥之名，或源于此。

康熙《永昌府志》记载霁虹桥沿革甚详：“霁虹桥，在城北八十里，跨澜沧江。古以舟渡，狭险湍急，行者忧之。后以篾绳为桥，攀援而渡。武侯南征，架木桥以济师。元贞乙未（1295），也不花西征，始更以巨木，题曰霁虹。丁酉（1297）冬宣慰都元帅达思撒而新之。元季桥圯，复以舟渡。洪武二十八年（1395），镇抚华岳铸二铁柱於石以维舟。后架木桥，寻毁。成化中，僧了然者乃募建飞桥，以木为柱，而以铁索横牵两岸。下无所凭，上无所倚，飘然悬空。桥上复为亭二十三楹，两岸各为一房。副使吴鹏题于石壁曰：西南第一桥。岸北设官庭，以驻使节。岁以民兵三十人更番戍守。然桥摇动无宁晷，铁索恒蚀。修于岳备王槐，再修于参将沐崧，复修于兵部郭春震。万历间又为顺宁猛酋所焚，兵部郭以仁重修，又修于兵备杜华、分巡张尧臣。明季复毁。本朝克镇督抚司道各捐金缴金，腾道纪尧典督建，两端系铁索十六，复板于缆上，又为板屋三十二楹，长三百六十丈（按：应为三十六丈），南北为关楼，宏敞坚緻，视昔有加。后毁于兵。康熙十二年（1673）总兵张国柱重建，吴逆时又毁。二十年（1681）知县蒋嘉谟重建。二十七年（1688）总兵偏图增修两亭于南北岸，桥旁翼以栏杆。日久损蚀，桥复摇。三十八年（1699）总兵周化凤，知府罗纶、知县程奕又重修之。”

《永昌府志》的这段记载是可靠的。汉时称这里为兰津，“津”就是渡口，显然汉时

无桥，是靠舟渡。这里所用的舟并非普通木舟，而是皮筏。因为江流险急，暗礁潜伏，稍一不慎，木船就会被撞得粉碎。白居易《蛮子朝》诗曰：“汎皮船兮渡绳桥，来自夷州道路遥。”元稹的诗也说：“鸟道绳桥来款附，非因慕化因危悚。”说明到了唐代，南诏使节到中原，沿途依然靠汎皮船、渡绳桥。《蛮书》卷二记载了兰津渡绳桥的式样：“兰沧江南流入海。龙尾城西第七驿有桥，即永昌也。两崖高险，水迅激。横巨大竹索为梁，上布簣，簣上实板，仍通以竹屋盖桥。其穿索石孔，孔明所凿也。”

有的文献说，早在东汉明帝时，澜沧江上就已经架起铁索桥。杨慎《南诏野史》说：“兰津桥——景东厅城西兰沧江，两岸峭壁飞泉，俯映江水，地势险绝，以铁索系南北为桥，东汉明帝时建。”

乾隆《景东直隶厅志》说：“兰津桥，距城百二十里。峭壁竦立，仰插霄汉，俯映沧江，飞泉激流，复蹬危峰，地势阻绝。以铁索系南北为桥。汉永平中造，久废。”

清王锡祺《小方壶輿地丛钞·云南略考》说：“景东厅治有兰津桥，为本省第一桥，两堤峭壁竦立，俯映沧江，而飞泉急峡，复蹬危峰，森罗上下，以铁索系南北为桥，汉明帝建。”

这些说法，似不可信。东汉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在澜沧江上架铁索桥。而且当时的歌谣说得很清楚，汉明帝是“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去“开不宾”的，并非由景东翻过无量山渡江去保山。

据桥梁建筑方面的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所谓景东的兰津桥是不存在的，始建于明成化年间的霁虹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铁索桥。他们对云、贵、川、藏、陕五省九十五座铁索古吊桥作分析比较：霁虹桥的宽度比泸定桥宽一米，是最宽的三座之一；承重铁索数量仅比贵州盘江桥少，为全国第二。这是因为该桥运输繁忙，载重量大的缘故。^⑬

渡过霁虹桥，西岸崖壁上前人题刻甚多：“西南第一桥”，“悬崖奇渡”，“人力所通”，“天南锁钥”，“金齿咽喉”等，道尽了其地的险要。明崇祯年间，徐霞客经由此地去保山，亦叹曰：“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⑭

由兰沧江西岸至保山的古道，保存旧貌的地段已经不多。罗眠山有一段梯云路，清季重修。刘锴《重修梯云路小引》说：“凿石为梯，穿云得路，羊肠曲折，十余里逶迤凌空”。^⑮由此可知，博南古道不能通车，只能依靠马帮驮运。由于过往马帮很多，天长日久，致使青石板上留下很深的马蹄印。由罗眠山，经山塔关，水寨，天井舖，倒马坎，官坡，金鸡村，便到保山。推测这些地名的由来，亦与博南古道有密切关系。山塔关显然是古代的一个关卡，到了水寨便可以饮马，天井舖是因道险天窄而名，过了天井舖马都累倒了，故有倒马坎，官坡可能设有官办机构，金鸡村是不韦县治。

通过对博南古道现存遗址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博南古道是东汉明帝时辟为官道的，并从那时起在沿途设关置驿。兰津是道中最重要的一个渡口，由舟渡而绳桥、木桥、铁索桥，反映了我国古代交通设施的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博南古道是以马帮驮运为主，少舟车之利。

三

博南古道的历史作用，可从内、外两方面来评价：对内加强了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的

联系，促进了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对外沟通了我国与南亚和东南亚的陆路交通，有利于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和友好交往。

先谈对内方面。

继秦常嫪开五尺道，汉唐蒙通南夷道，司马相如治西夷道后，博南道将四川至云南的两条主要交通线犍道和灵光道连接起来，并延伸到保山，使汉朝中央政府的影响深入西南边陲。故《輿地考》说：“汉四攫之盛，东乐浪，西敦煌，南日南，北凤门，西南永昌。”

博南道的开辟与永昌郡的设置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它们互为因果关系：博南道的开辟促成了永昌郡的设置；永昌郡的设置又加速了博南道的建设。永昌郡是汉时最大的一郡，“属县八，户六万”，“有闽濮、鸠獠、僇越、裸濮、身毒之民”，盛产“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①⑥}永昌郡治保山，成为边境重镇，中外商旅辐凑，有“金银宝货之地，居官者富及十世”之称。中央王朝在这里设官治理，“收其盐布毡罽之税，以利中土。”^{①⑦}

大理、洱海地区的开发和繁荣，也曾受益于博南古道。汉唐时期的中原先进文化技术，便是经由此道传入。《蛮书》卷七说：“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俩人前牵牛，一俩人持按犁辕，一俩人耒耨。”这种二牛三夫的耕作方法，即是中原的耦犁。^{①⑧}内地的先进纺织技术，也于唐时传入。“（南诏）俗不解织绫罗。自大和三年（829）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①⑨}在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时，“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学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②⑩}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南诏乐也传入内地。“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②⑪}

除开文献记载外，我们还可以从博南古道沿线的考古发掘，来看它在维系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

1938年在腾冲宝峰山下荒冢中，掘地发现公元118年汉武帝时铸的五铢钱共千枚。^{②②}

1979年至1981年腾冲共出土了三个铜鼓，分别属于第Ⅰ型的a式和b式。说明滇西的青铜文化和滇池青铜文化是互相渗透的，以铜鼓为代表的滇文化，可能在两汉时期便跨越了怒江。^{②③}

1978年5月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在清理千寻塔塔基和塔顶时，发现唐宋时期重要文物六百余件。其中有两面宋时的八棱铭文镜，镜背镌：“成都刘家□□镜子”，另一面为“湖州念二叔家镜子”。说明内地作坊的名牌手工业品已运销大理。^{②④}

1979年3月大理洱海东边的小岛上出土一罐古钱，内有汉五铢钱十三枚，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和“大布黄千”共三百三十三枚。^{②⑤}

清人师范在《滇系·旅途系》中对云南交通作了一番研究说：“属县间之道途通塞，命脉系焉。”道出了博南古道对内的重要作用。

对外来说，博南古道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方便。就在博南道正式辟为官道后不久，缅甸境内的国家相继派遣使节来中国。计有：

“永元六年（94），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②⑥}

“（永元）九年（97）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①

“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②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僧侣往来，除了走海路和绕道西域外，也有不少人选择博南道为陆路之捷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慧轮传》曰：“支那寺古老相传曰：是昔室利笈多大王时，为支那国僧所造。於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供停息。”义净作注说：“蜀川去此寺（支那寺）有二百余驿。”大约是采访了亲历此途的僧人而记。另外，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以北天竺与云南接界，欲假道而还。”可见印度僧人也有走这条道的。

除开使节和僧侣，来往人数最多的是民间商贾。他们把中国的丝绸、马匹^③、黄金、白银、铜、铁、竹木之器运销国外，贩进贝壳^④、琥珀、琉璃、宝石、香料、奇珍异兽等。在保山、银生城（景东）等地形成若干外贸市场。保山“南北街场星罗棋布”。^⑤银生城“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⑥

当然，充分肯定博南古道在内、外两个方面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险恶，走这条路毕竟是很艰难的。“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沍寒，又难登涉；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语言，兼賫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⑦而且仅靠人背马驮，所载货物有限。加上沿途食宿消耗，所费不貲。随着唐以后海运的发展，中外商旅多取海道。这条陆路通道虽历时二千余年而不衰，但亦不可能有太大发展。对它的估价，应持实事求是态度。

注释：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人市’。”

②《史记·平准书》。

③《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④诸葛亮《出师表》。

⑤《三国志·蜀书·吕凯传》。

⑥《隋书》卷五十三《史万岁传》。

⑦《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⑧《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韦皋传》。

⑨盐津县豆沙关袁滋摩崖题词。

⑩载乾隆《腾越州志》卷之三。

⑪参阅方国瑜《古涌步之位置》，《步头之方位》。载《滇史论丛》第1辑。

⑫宋王佐《云南买马记》，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

⑬潘洪萱《云南兰津桥与霁虹桥考》载《同济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⑭《徐霞客游记》滇游记之八。

- ⑮刘锴《梯云路小引》，载光绪《永昌府志》卷六十五，艺文志记。
- ⑯《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 ⑰唐张柬之《请罢姚州奏疏》，见《旧唐书·张柬之传》。
- ⑱《汉书·食货志》说，赵过教人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 ⑲樊绰《蛮书》卷七。
- ⑳《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
- ㉑宋郭允蹈《蜀鉴》卷九、十《西南夷本末》。
- ㉒《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一。
- ㉓李伟卿《腾冲县发现古代铜鼓》，载《云南文物》第11期，1982年6月出版。
- ㉔王立政《洱海文物漫谈》之二，载《大理文化》1982年第8期。
- ㉕田怀清、杨德文《大理洱海东岸小海岛出土一罐古钱》，载《云南文物》第11期，1982年6月出版。
- 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 ㉗《后汉书·和帝纪》。
- ㉘《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 ㉙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第245页说：“这个省（云南）养了许多马，送到印度去卖。”
- ㉚同上书242页说：“在这些省里他们也用白磁壳作钱币，象我以前告诉过你们的样子，但这些贝壳不产在这国，他们全从印度来的。”
- ㉛光绪《永昌府志》卷十七，市肆。
- ㉜樊绰《蛮书》卷六。
- ㉝佚名《南方记》，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

宋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和邦交关系

江 醒 东

宋代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贸易和邦交两方面。宋廷为了解决国家经费问题，必须发展海舶贸易，而为了发展海舶贸易，又必须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随着两国友谊的加强，通商关系就更为密切；同时这种密切的经济交流又促进了两国邦交的巩固和发展。宋代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关系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一

我国自汉、唐以来就和印度尼西亚有了贸易关系。到了宋代，两国贸易更有了广泛的发展，这和两国当时的需要与可能情况有关。

宋朝整个时期，北方兵患都很严重，北宋时契丹、西夏更迭入侵，金人夺取中原后，南宋偏安江南。疆域缩小了，岁入随之减少，另一方面为了防御却不能不增加必要的开支，这只好不断增加兵费和扩大和议纳款，〔1〕再加上朝廷优厚的俸禄恩赏，此三项支出使宋朝国家财政陷于极度困难。

面对困难的财政状况，宋廷的开源解救之道是，“国家根本，仰给东南”，〔2〕而“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3〕舶商收入非常可观，并正式列为国家收入的一个主要项目。

海舶收入又以什么为大宗呢？《宋史》食货志云：“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唯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4〕香料来自各国，其中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为两大来源，据《诸蕃志》下卷志物篇所载，四十七种海商输入品中，有二十九种是香料，在这些香料中又有十六种是印尼的特产和它也有出产的产品；〔5〕同时阿拉伯的香料也要取道印尼这个中间站才能运进中国，或者由三佛齐买下再转贩中国。《诸蕃志》三佛齐国条载：“外有……乳香、蔷薇水、梔子花、腊脐、……皆大食诸蕃所产，萃于本国”。这就是为什么宋代中国和印尼贸易广泛发展的重要原因。

再从印尼的需要来说，显然中国是印尼土特产香料等的好市场，尤其是胡椒，中国人是当时最大的收购者。在印尼学者看来，连印尼“派使者赠送各种土特产给中国皇帝”，也“是为了把印尼的土特产介绍给中国”；〔6〕印尼人从贩货中可以换取许多宋朝的金、银、铜钱回国，这对它当时“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7〕的情况来看，正切合它的需要，果然到了后来，市中交易便公开使用中国历代铜钱了；而且，中国的丝绸、陶瓷等手工业产品又极受印尼人民的喜爱。所有这些对印尼的吸引力都很大，有利于促进两国贸易的广泛发展。

宋代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易广泛发展,除了其必要的因素外,也完全有其可能的条件。因为宋朝政府实行发展生产的政策,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宏厚的物质基础。首先农业在唐末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南方,如两浙“地沃而物颖,……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8〕其次,宋代的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举其与印尼贸易特别有关的铜冶、纺织和陶瓷来说,如以铸钱业中心的东南地区为例,开宝八年(975)平江南之初,铸钱才七万贯,1007年增达一百八十三万贯,三十年内增至二十六倍;到元丰年间,一年之内全国铸铜钱总额达五百零六万贯,其中南方约占71%。〔9〕又以纺织业为例,不仅汴京、成都分别设有规模宏大的绫锦院和蜀锦院,东南一带更是重要的纺织中心,“茧薄山立,繰车之声连薨相闻”,〔10〕产品种类很多,而且质地精美。再以陶瓷业为例,宋代制作技术有了空前的进步。北宋起,陶瓷业的分布,南北并峙,互相辉映,特别是景德镇的产品“尤光致茂美”。〔11〕这些釉彩鲜艳的陶瓷大量输入印尼诸国。《萍州可谈》提到海舶装货的情况是,“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2〕宋代陶瓷已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宋代造船业的发达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又为发展与印尼等国贸易铺平了坚实的道路。这种造船业分布北方和南方,但南方的技术不仅高于北方,而且远超唐代的水平。大型的海舶“深阔各数十丈”,载重五千料(每料等于一石),可搭五、六百人;〔13〕它有先进的航海设备,在江洋大海中可以战胜风涛,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印尼等国的贸易。

印度尼西亚方面具备与中国贸易的可能条件是盛产宝货和位于中西交通的中站。据《诸蕃志》、阁婆国条云:“其地平坦,……产稻、麻、粟、豆;……出象牙、犀角、真珠、龙脑、玳瑁、檀香、茴香、丁香、荳蔻、革澄茄、降真香、花簪、番剑、胡椒、檳榔、硫黄、红花、苏木、白鹦鹉;亦务蚕织,有杂色缟丝、吉贝、绫布。”〔14〕又同书三佛齐国条云:“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荳蔻;……”〔15〕《岭外代答》也指出:“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阁婆国,其次三佛齐国”。〔16〕在地理环境上,三佛齐居“诸蕃水道之要冲”,“西至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17〕当时中国和大食直接交通,往返一次需时二年,因此有不少商人把货物运至三佛齐,再转卖给中国。

宋朝经办与印度尼西亚诸国的贸易有一定的港口、机构和航路。

宋朝沿循唐制,公元971年首先在广州设市舶司,后来又在杭州、明州、泉州……等十一处港口相继设置。市舶司的职责有四:一、给海舶登记,发给公凭、引目;二、征收税品;三、收买舶货;四、兼充宋廷商品的批发所。北宋时广州、杭州和明州“三司”掌握极大部分的海外贸易,特别是广州最为重要,以与印尼最有密切关系的乳香为例,1077年“三市舶司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中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18〕南宋以后,泉州不仅取代了杭州和明州的地位,而且到了宋末更超过广州而跃居第一位,成为进出口的大港。与印尼贸易的港口主要是广州和泉州,当时三佛齐与广州、泉州之间,阁婆与广州之间都开辟了定期航线。根据信风“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三佛齐至广州,顺风二十日(否则一个多月〔19〕)可达,至泉州则一个月才到;而广州至阁婆,顺风一月可到。中国海舶每年开往阁婆万丹的有三至六艘,另外商人

亦有自己的海船开赴印尼贸易。

宋朝为了奖励、保护和控制海外贸易，规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一）招引和保护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派遣专使分赴印尼诸国招徕通商。凡海船启航和外舶返国时，宋制皆设宴欢送。1132年广南舶司说：“……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番、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官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20〕有一次宴席上曾由“蕃长”引三佛齐人来“诵孔雀明王经，”〔21〕可见对印尼商人的重视。外舶遇到风灾人祸等意外，宋廷立法加以保护。1099年户部言：“番舶为风飘著沿海州界，若损坏及舶主不在，为官拯救，录货物，许其亲属召保认还；及立防守、盗纵、诈骗断罪法”。〔22〕

（二）统制海舶和商品

宋廷对于海商虽然诸多招引、保护，但不是自由出入的贸易，海舶出发前必先赴所在地市舶司登记，领取许可证。回航时仍要于开航处停舶，违者治罪。《宋史》食货志载：“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又“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23〕

宋太宗以前，外舶货物的输入，抽取关税后，便准予自由买卖，但“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西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24〕榷署就是博买制度，即由国家把外舶货物全部或一部分收买后再分卖给人民，这样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大利。凡海舶入港，经市舶司抽解，收买之余，才准与人民贸易。收买的品种起初没有分别，太平兴国七年（982）才分为绝对禁榷品与非绝对禁榷品两类。当时禁榷物有玛瑙、玳瑁等八种，后来增加紫矿、瑜石，共为十种；放通行药物有木香、槟榔、石脂等三十七种。〔25〕淳化二年（991）规定，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粗恶者”不予收买。〔26〕国内商民虽不能与外商自由贸易，但可以自由置船，向舶司登记，可与外舶一样待遇。

（三）抽解税率

北宋初年税率较轻，“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27〕淳化二年（991）改为十征其二；〔28〕北宋中年以后，国家经费日益困难，市舶的税收有所提高，“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瑇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29〕南宋时，国家经费“一切倚办海舶”，税率竟有一度抽收十分之四的，〔30〕而且除正税外还巧立名目，多方抽解，甚至强迫舶商输纳，如隆兴二年（1164），臣僚说：“……迩来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择其良者，如犀角、象齿十分抽二，又博买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买六分”。〔31〕

（四）奖罚制度

对于招引和抽买工作有成绩的给予封官晋爵。绍兴六年（1136）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绣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32〕

对印尼等国商人给予各种优待和便利，如“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赏，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33〕广州设有“蕃坊，……置蕃长一人……专切招邀番商入贡”，唐代就有印尼人蒲诃栗立曾任蕃坊长，到了宋代印尼商人更受到重视。

在榷榷之初，规定犯禁的罪罚很重：如三佛齐船商运乳香至中国，所在市舶司以香料是榷货，抽分之外，尽归官卖。这时如果谁“敢私与蕃商货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上鰕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妇人犯者配充针工”。〔34〕但自太平兴国七年（982），放通行药三十七种之后，人民于市舶司抽解、抽买之外，可以向外商直接贸易，但仍要领取公凭、引目，才可通行。

为了保障舶商的正当权益，对于官吏的非法剥削或强行征收和收买，致使舶商蒙受亏损的，要受到宋廷不同程度的处罚。如绍兴十六年（1146）三佛齐国王寄信给市舶官，陈述近年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当年的市舶司袁复因而受到降职处分。〔35〕宋廷又规定：“因风水不便、船破檣坏者，即不得抽解”；“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舶至除抽解和买，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36〕

宋代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有一定的地区和各种各样的商品：

根据宋人著作《云麓漫钞》和《诸蕃志》所载，当时与中国贸易的诸国中属印度尼西亚的有阇婆、新条或新拖（即巽他）、苏吉丹、三佛齐、监篋、蓝无里等古国，其中以三佛齐和阇婆最为重要〔37〕。新拖、监篋和蓝无里都是三佛齐的属国，苏吉丹又是阇婆的支国。这就是在宋朝时期印度尼西亚所包括的好些王国或地区的情况。中国商人前往这些王国或地区贸易的，史籍亦有记载，如《夷坚甲志》载：“泉州僧本僑说，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38〕1138年建立的莆田祥应庙碑记述：“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宋史》《阇婆传》载：福建建溪主舶大商毛旭“数往来本国”，“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诸蕃志》云：苏吉丹甚至“厚遇商贾，无宿泊饮食之费”。〔39〕可见中国商人在印尼是很受欢迎的。

《云麓漫钞》记述诸国船舶开到中国贸易的货物时说：三佛齐诸国有“真珠、象牙、犀角、脑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玛瑙、玳瑁、龟筒、梔子香、蔷薇水、龙涎等”，并谓“阇婆国多药物（茴香、荳蔻、胡椒、槟榔……等）”。〔40〕又据《宋史》载：开宝四年在广州置市舶司后，阇婆、三佛齐诸国“并通货易”，中国人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等换买它们的香药、珍物、琥珀、珠琲、银铁、鼈皮、车渠、水精、蕃布、乌棉、苏木……等物。〔41〕范里尔的《亚洲古代商业》一书有更具体的记载：中国商人经营的各种贵重的国际商品，例如丝绸、瓷器、漆器、铜器、纸、药物、糖、手工业奢侈品等。印尼人交换的物品是各种香料、檀木、金、宝石、珍奇物品、锡……等，另印尼的燕窝也是中国商人非常喜爱的食品。〔42〕这些充分反映了宋代中国和印尼的贸易货物是非常丰富的。

宋代中国和印尼贸易的结果，既有其积极的作用，也有其消极的影响。

两国贸易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对中国来说，海舶贸易（包括对印尼的贸易）的收入对宋廷的财政困难是起了很大的弥补作用的，据王应麟的《玉海》载：“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次后岁入二百万缗”。〔43〕这里表明，北宋中年以后，政府由海舶得到的收入已经不少，到了南宋，岁入更达二百万缗之多，其中印尼所占的比例，按贸易情况来说当然很大。难怪宋高宗承认“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44〕

两国贸易的发达，又促进了物质文化的交流和经济事业的发展。印尼运来的物品除一

都分供贵族阶级享用外,也有许多是一般生活所需的,如著名的香料就有很多可作民用的药材——龙涎香能止心气痛,沉香主治喘息,乳香可治哮喘……;苏木可用作染料,……。海舶贸易的发达,还推动了宋朝商品经济、特别与出口有密切关系的部门如丝绢和陶瓷等的蓬勃发展。如南宋时统治者每年征收“上供丝帛”,单“江、浙、湖北、夔路岁额绉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纁七万匹。”〔45〕税收的多寡,一般表示了生产和流通的发达与否。各地新窑如雨后春笋,特别广东、福建沿海出现新窑更多。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纺织业和陶瓷业的发展概况。造船业也是随着海舶贸易的兴旺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福建和广东海船的闻名,就是一个例证。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与中国的贸易刺激了它的社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曾使三佛齐和阁婆(特别是爱尔朗卡和谏义里时代)的国势日益强盛起来;并且丰富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如苏吉丹当时“饮食不用器皿,絨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46〕自宋瓷输入后,他们已逐渐有所改变;中国铜钱大量流入印尼,对它的货币使用和商品流通起了促进的作用。

另一方面,宋代中国与印尼诸国的贸易,无可讳言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主要是造成了奢侈浪费的风气和大量金钱流失的弊端。例如“大观、宣和间(1107—1125),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47〕这暴露了宋廷对边防和国计民生可以不顾,而以收买浮靡之物为先。特别是香料,贵族阶级对它有特殊的嗜好,如宣政宫中一夜燃点龙涎香烛数百枝;〔48〕卿相蔡京焚香,使坐客“衣冠芳馥,数日不散”;〔49〕妇女犍车驰过,竟至“香烟如云,数里不绝”。〔50〕当时香料的售价很贵,有一饼可值百缗的,龙涎香甚至每斤值九千文,〔51〕全国合计起来,所花费的金钱不是很惊人吗?

宋朝,特别自南迁后,“铜钱之泄尤甚”,〔52〕《诸蕃志》阁婆国条载:“此蕃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53〕可作为证明。宋朝开国以来先后所铸铜钱何止千万缗,但后来竟闹起“钱荒”,〔54〕弄到“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因此“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昔闻丰年乐,今识丰年苦”,〔55〕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钱荒的原因虽有多种,但对印尼诸国的海舶贸易,使到铜钱大量外流,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

为了发展海舶贸易,必须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根据前述宋朝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它对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诸国采取友好睦邻的对外政策。《宋史》外国传载:“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来则不拒,去则不追;……不黷以武”。〔56〕实行这一政策,对促进与印尼的邦交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五月“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57〕这里的海南诸国中当然包括印尼的古国在内。真宗晚期,外舶到广州的略少,天圣六年(1028)就下诏令要“本州与转运司,招诱安存之”。〔58〕在宋廷这种主动的外交活动和上述一系列贸易政策的贯彻下,大大发展了与印尼的三佛齐、阁婆诸古国的邦交关系。这种邦交关系其实与贸易关系是分不开的。由于地理位置和传统关系,宋廷非常重视三佛齐。《萍州可谈》云:“海南诸国,……三佛齐最号大国”,它与中国的邦交关系也最密切。据不完全统计,从宋朝开国至淳熙五年(960—1178)之间,三佛齐派遣使节访问中国约共三十六次,按照任务和需要,或者派使节一人,或者派正副使各一人,有

时还有判官和随员等，可以多至二十人。每次派来的使节都带有隆重的礼物赠送，即所谓“朝贡”；而宋廷也给予优厚的答谢，即所谓“回赐”。礼物的丰富有时简直美不胜收，例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佛齐的使节赠龙涎一块三十六斤，真珠一百一十三两，珊瑚一株二百四十两，犀角八株，梅花脑板三片，又梅花脑二百两，琉璃三十九事，金刚锥三十九个，猫儿眼睛指环、青玛瑙指环、大珍珠指环共十三个，膈脐二十八两，番布二十六条，大食糖四琉璃瓶，大食枣十六琉璃瓶，蔷薇水一百六十八斤，宾铁长剑九张，宾铁短剑六张，乳香八万一千六百八十斤，象牙八十七株共四千零六十五斤，苏合油二百七十八斤，木香一百一十七斤，丁香三十斤，血竭一百五十八斤，阿魏一百二十七斤，肉苁蓉二千六百七十四斤，胡椒一万零七百五十斤，檀香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五斤，笈香三百六十四斤。〔59〕宋廷对三佛齐使节亦“每优赐遣归”，如元丰二年（1079）一次就回赠钱六万四千缗、银一万五百两，对请求购买金带等，都答应一概照给；〔60〕有时还以丝绸、瓷器等名贵物品回赠。可见来礼愈多，回赠也愈厚，这不仅互表盛情，也反映了交换的兴旺。马端临说：“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61〕不仅如此，宋廷还以封爵来吸引国王和使节，一般封国王和正使为“将军”，副使和判官为“郎将”，个别副使也有被封为将军的。毫无疑问，受封者是引以为“荣”的，而宋廷则以此作为“羁縻”的手段。三佛齐使节甚至受到特别的待遇，如“封禅”是封建皇朝罕见的盛典，宋真宗于1008年举行过这种大典，三佛齐来使适逢其会，被邀“赴泰山陪位于朝觐坛”；〔62〕又宋廷按常规对一般使者赠给间金涂银带，但对三佛齐1028年的来使却“以浑金带赐之”，〔63〕表示殊礼。1082年，三佛齐判官回国，经过雍丘时病逝，宋廷赠绢五十匹，作为抚恤金。〔64〕其待遇之厚，可见一斑。

三佛齐与宋廷建立友好关系，还运用了迷信和宗教的因素来表示和促进两国邦交和贸易的密切。它的使节第一次到宋廷时就带有这个成分，据《枫窗小牍》载：“艺祖受命元年秋（指建隆元年即960年），三佛齐来贡，时尚不知宋皇受禅也。贡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龙擎一盖，其龙形腾上而尾少左向，取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岂偶然哉。艺祖即以此犀为带，每郊庙则系之”。〔65〕这虽然是迷信，但对促进两国的邦交和贸易关系，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说这是不自觉的巧合，那么另一个事例就是完全有意识的了：咸平六年（1003），三佛齐来使说：“本国建佛寺以祝圣寿，愿赐名及钟”。〔66〕三佛齐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它这一请求，对实行神道设教的宋真宗来说可谓“正合孤意”所以大“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额，并以钟赐焉”，〔67〕不久，宋真宗诏天下置天庆观（详下），并大演得天书，封泰山的“喜剧”，这些事情不论对宋廷和三佛齐诸国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诸蕃志》三佛齐国条在“赐钟”之后接着说“至景德祥符、天禧、元佑、元丰，贡使络绎”，〔68〕看来不是偶然的。

类此的事，还有三佛齐大首领地华伽罗捐款修建广州天庆观的“善举”。

宋真宗为了利用神道设教来保护它的统治，先把年号改为大中祥符，并于第二年（1009）诏令全国建天庆观。广州当局即刻把唐代的开元寺改为天庆观，但1052年侬智高攻打番禺时把它烧燬了。1064—1067年间，三佛齐大首领地华伽罗来往广州贸易的亲人口中获悉此事，便慷慨解囊，捐舍鉅款，先后三次派人到广州进行修建，历时十二年才竣工，在广州府治西（今海珠北路祝寿巷一带）再出现一个“铃铎交音，……金碧相照”的天庆观。同时又捐献四十万金钱在南海、清远等地广置田产收租，作为维持费用。〔69〕